文史哲研究丛刊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李德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文史哲研究丛刊

宋四六论稿
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研究
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K·805 定价：42.00元
ISBN 7-5325-4282-3



文史哲研究丛刊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李德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李德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7-5325-4282-3

Ⅰ.唐… Ⅱ.李… Ⅲ.文学家—公共场所—影响—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唐代 Ⅳ.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692 号

责任编辑 杨万里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文史哲研究丛刊

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

李德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市新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338,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5325-4282-3

K·805 定价：4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李德辉 （1965——），男，湖南汨罗人。2001年7月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湘潭市“十大杰出青年”。出版《唐代交通与文学》、《李贺集》（校注）等著作。在《新宋学》、《中国文化研究》等刊发论文40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各一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湖南省“十五”规划重点建设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资助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成果之一。湘教通[2004]284号

序

陈尚君

本书是德辉的第二本专著。他的博士论文《唐代交通与文学》出版时，拟请我作序，我忝为导师，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但那段时间实在太忙，因而爽约，至今仍感遗憾。当他再次要求我为本书写序时，我虽然觉得课题的内容不太熟悉，恐怕难以写出准确的感受，只是因为前此的愆失，无以推托，只能勉力而为之。

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改先前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习惯，在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一是基本文献的发掘、笺释和考订，全唐诗文的增补、各家别集的校注以及各种文学专书的研究，已大致臻备；二是作家研究的深入，并进而发展为对文学集团、地域文学和文体迁变的全面探讨；三是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相互关系交叉研究的展开；四是在以上几方面的基础上，一批优秀的断代文学史专著的出现。

唐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是在唐代特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她得到那个时代的滋养，也带给那个时代以无限的光荣。她的特质和风貌，是由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各领域的综合因素交互影响而造成，就如同牡丹的光华绚丽，是因为她植根于肥沃的土壤，得到了园丁细心的呵护，得到了全社会共同的提携，加上高贵的内蕴和气质，终于达成一代的辉煌。深入探讨包括政治、军事、艺术、宗教、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社会因素的特点，及其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关系，阐明文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是最近二十多

年间许多学者努力开拓的研究方向，已有的成果涉及范围较宽，创获甚多。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用描述式的写法，揭示唐代科举制实行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状况，以及对文人心理、生活和创作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改变，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有关唐代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程功较多的是陈允吉先生和孙昌武先生两位。孙昌武对佛教、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述面较宽，陈允吉先生则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他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最好的几篇文章，如对《长恨歌》所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的分析，对韩愈诗歌与寺庙壁画关系的阐说，对李贺思想所受《楞伽经》的影响，都很有深度和新意。更年轻一辈的学者致力于此而有所建树的，可以举出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查屏球《唐诗与唐学——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等。德辉的博士论文《唐代交通与文学》以及本书，则分别在两个全新的领域，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一般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可以与他的硕士论文有联系，但在学术追求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一定要比前此有质的飞跃；二是依据各人的才智和潜力，尽可能地鼓励学生从最原始文献的阅读中开展研究，支持他们在阅读中发现课题，尽可能地做前人较少涉及而具有开拓意义的课题；三是鼓励做个人研究中特别有兴趣探讨且有独特心会的课题，即使学术难度较大，也激励他们克尽努力，以求胜任；四是选题应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不仅可以保证学位论文达到预期的学术水平，也能够顺此而展开一系列研究，奠定一生的学术格局。在我的记忆中，德辉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并没有费太多的曲折周章。在我罗列了一批合适的选题后，他很快就从中选定《唐代交通与文学》（最初考虑是"唐代南北交通与文学迁变"），并立即着手搜寻文献，梳理论点。我最初曾担心此一选题文献分散，头绪众多，铺开容易，深入不易，

恐怕他难以做好。但相隔不久，当他询问我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以及佛藏之中几种行记的有关问题时，我即坚信他足以胜任于此。在完成的论文中，他分别就“水陆交通与文学创作”、“行旅生活与唐文人心态的变化”、“唐代交通与文学传播”、“唐代交通与唐人创作方式的新变”、“唐代交通与文学母题的拓展”、“南北交通与唐南方落后地区文学的发展”、“唐代交通的发展与文学风格的变化”、“唐代交通与唐人行记”等问题展开论列，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而上列各项子题，又多可以展开作更深入的探讨。德辉近年在行记研究和馆驿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方面又有一系列的写作计划，是我尤其感到欣慰的。

德辉毕业后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追随陶敏教授从事唐代文学与文献的教学与研究。陶敏教授是我在唐代文学领域最敬畏的学者之一。他在错划右派二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中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在图书资料不太便利的湘潭坚持研究，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他一起工作，德辉又得到了许多的指点。本书的完成，就是他随陶敏教授继续开拓研究的成果。相对于《唐代交通与文学》来说，本书涉及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为重要，论述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文馆设置虽然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唐代承袭旧制，但又有不少新的变化，文馆有多种类型，功能不同，职掌有异。文馆学士虽以整理典籍为日常职守，但实际责任常包括代君相起草文书、为皇帝提供咨询等，甚至因为密勿中枢而参与决策。文馆集中了大批文学上有很高造诣的人物，他们的文学活动频繁，且居于文学枢纽之地，对于当时的风气转变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认为，以文馆为依托的文学活动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馆学士的取向影响文学的发展进程，而文馆学士的选拔和任用又是唐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此一环节显得特别的交融混杂，互为作用，难以区分。对此要作清晰、完整而有深度的论述，难度可以想见。德辉在《导论》中自述写作心得时，认为本书“以职

官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为基础，高度重视史料文献的全面占有，为此广泛搜集了分散在各种不同类型史书、笔记、方志、碑刻、敦煌文献、时人文集中的材料，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可靠基础上。也作了必要的理论探讨，运用'历史—文化'批评方法，将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职官制度、文化思潮、文人心态、文体发展、文风变迁结合起来看问题，从面论证了文馆发展和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故文史结合，微观考证与宏观阐述结合，是本书的主要特色"。我以为是大致客观的叙述，全书也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就我对本书的阅读感受来说，与他的前一部著作相比，本书分析更为客观细致，叙述更为澹定从容，行文也更缜密周详，显示了德辉学术能力的明显进益。至于本书的学术评价，可以由读者作出，我在此就不作评述了。

德辉出生于湖南汨罗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沟。1981 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湖南师大，却因家境贫寒而放弃了求学的机会，为生存而务农，各种农活都干过，甚至做过篾匠。即便如此，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追求。1987 年后，先后在村小和镇中心中学担任代课教师，他将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上，并始终坚持英语学习。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通过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自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于 1995 年考入湘潭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蒋长栋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可以说，他的成才之路是艰辛而曲折的，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逆境，但这样的逆境则使他更加磨砺了意志，激发了潜能，培养了独立思考研究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时时感到他以超过常人的意志和努力磨心于此，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自我超越。在回到湖南工作的四五年里，课务忙碌之余，完成了一批论著的写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张载《西铭》"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的名言，在德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德辉现在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得到了多项课题经费，有机

会大展身手，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在心怀期待的同时，更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数量的增加，不要重复自己，不要在乎当前学界流行的风气，努力追求更高的目标，开拓新的学术空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此，我愿意说到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我比德辉年长十多岁，经历了文革的特殊时期，当了八年知青，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失学和自学的时期。就此点来说，与德辉的经历很相似，都是先自学再进入专业学习，区别只是我始终没有感受到生存的危机。自学而后能够成才者，其长处是对于学术有刻意追求的主动精神，且不像经历了漫长应试教育的学生那样，受到太多的固定知识框架的束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想像。但自学者的最大缺陷，则是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准确性稍差，对学术的体悟和追求常不免因缺乏名师指点而有所偏差。我在得到机会进入复旦学习后，所幸能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断反省自己的欠缺，转益多师，并广泛学习近代以来学术大师的治学方法，寻觅到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但即便如此，早年失学留下的一些缺憾，总不免会在某些时候显露出来。虽然我可以向朋友解嘲地说到，对于一个仅读过一年中学和一年大学就进入研究生学习的人来说，其长处和短处经常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清夜长想，每多遗憾。近年有机会多次到海外访问讲学，开阔了眼界，也更加体会到国学研究也更多的具有国际化的意义，以往的闭门研究不免有许多的缺憾。虽然现在国内一般大学的图书条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于学者来说，追求学术的前沿意义，无疑应以充分了解海内外已有的全部研究为目标，努力追求具有国际意义的高水平研究。我自感要达到此一目标有很大的困难，但愿意始终努力追求，争取做得更好一些。不知德辉对此是否赞同？

前不久到泰兴朱东润先生故居参观时，见到朱先生早年的两段题词，一段是其年轻时的自勉六要："做人要诚实，读书要用心，运动要努力，遇事要和平，时间要爱惜，钱钞要分清。"一段是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7年为其子中学毕业的题词:“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朱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以上两段话大约可以说是他一生为人为学的写照。正是以此种态度,他始终不渝地追求学识,认识人生,即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和追求。朱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人格上也为后学树立了楷模,值得我们永远景仰。谨述此以与德辉共勉吧。

2006年4月10日于上海武川路寓所

导　论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开国君主都深深懂得天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的道理，所以建立政权后都非常强调"文治"。为此，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魏晋南北朝，虽然王朝政权更迭频繁，但南北诸帝都重视儒学，开馆纳士，有时甚至亲自过问，主持文事，此间文献记载的"馆"多达近十种。虽然诸多的"馆"随着那些短命王朝的相继覆灭而终结，但其遗留下来的开馆置学士的办法与馆殿制度对后代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唐承隋后，将这一套做法与制度全盘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李渊父子深知文教的重要性，太宗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一》)。唐前期历代君主，出于不同的考虑，设立了不同文馆，附设在中书、门下、东宫等政府机构的，有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常设性文馆，此外，又在禁中设习艺馆、奉宸府，国子监中增置广文馆，这些则都属临时性的"馆"，名目之繁，变化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秦王文学馆中置十八学士，时人倾慕，谓为"登瀛洲"。由于有皇帝亲自过

问，宰相出面掌事，其规格更高。中宗景龙年间，修文馆规模更盛大，气象更壮丽，“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新唐书·李適传》）。其时，修文馆中鸠集学士近三十人，经常举行规模宏大的宴集。玄宗在两京及华清宫均设集贤院，自开元十三年（725）成立集贤院迄于天宝之末，三十余年间，学士通籍出入其间，在馆学士及直学士以下职员，今天能考知的多达一百四十三人，常年编撰图书，校理经籍，每年从各地调集大量纸张笔墨入院，耗费巨大。天宝末，院内藏书达九万卷。无论弘文馆、崇文馆还是集贤院，都巍峨壮丽，临近宸居，气象清穆。所有这些，在中古时期都是罕有其比的。而学士选除之精，委寄之深，进擢之速，资任之优，荣誉之高，尤著名于青史。

隋唐时期，随着台省制度的定型，台省下面的附设机构——文馆也逐渐制度化，文馆建立了系统的组织体系，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馆中人员的名称固定，职掌固定，官员的选拔任命有一定规章，较之于先唐，唐文馆的职能更齐备，发挥的作用更大。

文馆虽然主要是为编集校理经籍图书而设置，但学士都是从朝官中选拔的职事官。入馆之后，担任学士这份兼职，直接听命于皇帝。为了方便皇帝顾问，学士轮番宿直于宫中，随时引见，讨论坟典，商量政事，甚而至于“夜分方罢”（《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其与皇帝的亲密程度有过于外朝宰相、尚书。文馆学士见识广博，学问优长，通晓古今成败得失，因此其受到皇帝的普遍重视，陪侍饮宴，出入禁中之际，军政大事，常相咨访，学士每每为其出谋献策，嘉言密谋，往往出于其中。武德四年（621）以后，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李世民之所以能在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秦王文学馆中的众多学士。太宗以下诸帝为了稳固储宫，常在东宫置崇文馆，馆中置崇文学士。这些学士名义上的任务是辅导皇太子学习，然而因与皇太子朝夕相处，遂成为皇太子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值得信赖的谋

上。当他遇到强劲对手的时候，学士就成为他"固位"的心腹和得力助手。由于名利的巨大诱惑，皇室诸王中，往往不乏窥伺东宫者，此类阴谋若要得逞，又不得不借重于学士。贞观年间，魏王泰欲"夺嫡"，在太宗的许可下，于王府开馆自辟学士，以编书为名，紧锣密鼓地策划这一政治阴谋。在斗争中，太子承乾一方处于明显的劣势，最终被逼采取措施反抗，事败宫废，东宫学士悉数逃匿诛贬。武后二子孝敬皇帝李弘、章怀太子李贤，品行端正，聪明能干，册立为皇太子后，勤政爱民，深得人心，很有威信，这对野心勃勃的武后造成了极大威胁，武后时时对其施加压力，储位不稳。于是他们也在府中开馆置学士，编修类书、疏注古史，希望藉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最终仍难逃失败的厄运。中宗的被鸩杀，也与修文馆学士如宗楚客之伦有莫大的干系。由此看来，文馆学士常常卷入宫廷权力角逐，这使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也使得他们的命运充满变数。其幸运者，多因有侍从供奉之旧，而在昔日主子得登大位之后屡承恩宠，封妻荫子，九族荣光；其不幸者，则因故主在斗争中惨败而遭贬逐，甚至招致赤族之诛。上面所说的，都是文馆学士介入唐代政治的常态。

既然文馆是一个兼具政治咨询决策作用的机构，文馆学士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过多重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探究唐代文馆与政治的关系。

唐朝统治者最重视文学才华，美官美职多以专待有文采者。且不说朝中的清要官位，就是普通的佐录簿尉之类州县官职，多数也为富有文学才华者所垄断。总之一句话，唐人的仕宦状态的好坏，也取决于文学艺术才能的优劣。

唐人很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凭文才入仕的官员，很多时候被要求以文学服务于政治，唐代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中，有很大部分是这样的作品。在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院任职的文馆学士有很多机会操管弄翰。中书制诰、翰林制诏，多出其手。学士还经常代

替皇帝或权臣贵戚捉刀。唐朝立国之初，学士就参加了前代史、国史的修撰，律令格式的制定。以后每逢朝廷举行重大仪典，必召集礼官、学士反复讨论，草定仪制，撰写相关文告。甚至连祭祀天地祖宗、历代帝王的宗庙音乐歌词，亦多出自文馆学士之手。也许在今人看来，这些文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却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由于都是代掌王言，所以受到普遍重视。领命的词臣，都不敢掉以轻心，无不竭尽全力，认真对待。用今天纯文学的眼光看，这类文书价值自然不高，但唐人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对待的，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就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在唐代，政治性文书是很多文人文学创作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如果去掉这些东西，那他们的文学成就就无从谈起，唐代文学史也就不完整了。故学士制作的文学及其政治功能，以及二者之关系，也是我们研究唐代文馆与文学应当关注的。

对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视和强调，促使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来强化它，开馆置学士属于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一项。馆中学士常奉诏参议朝廷礼仪轻重，制度沿革，献纳谋议，以"敷德教"。同时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撰集文章。唐前期就以这类名义征集了大量学士入馆。选调的都是来自南北各地的文化精英，长时间的共同相处使他们得到很多切磋文艺的机会，不仅增进了自己的才学，其文学也随之精进。所以文馆的兴办客观上培育了作家群体，文馆兴废与作家群体的聚散是我们应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统治者除了需要文人学士代草王言外，更需要文人陪游侍宴，制作诗赋，当时称为应制、应教。这既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也增添了京城宫禁欢乐祥和的气氛。唐前期文馆学士创作的诗赋，大部分是这种应命之作，作品数量极大。虽然今人看来不过是帮闲文字，缺少真情实感，往往矫揉造作，阿谀奉迎，表现出十足的奴颜媚态，很不足取，但奉和圣制是统治者对于文人政治地位和文学才华的一种高度肯定，而且无形中成为一种很权威的评定，这在唐

文人看来是十分荣耀的事，因而颇为重视，其在唐代文史载籍中记载之清晰，《全唐诗》中保存作品数量之多，都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思想内容无足称道，但这类作品讲究技巧，形式规范，需要很高的才能，否则难以胜任。后进文士入馆，多不习此体，而不得不向擅于此体的前辈学习。就这样，自武德、贞观至于景龙、先天，开元、天宝，一辈又一辈学士相继入馆，宫廷中的游宴文会一直比较频繁。学士们宿直禁中，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对文馆周围环境观察得非常细致，写出了不少馆中即景抒怀的佳作。为了提高应制技艺，还开展评比竞赛活动。为求得帝王、妃嫔、贵戚的宠信，众学士莫不在诗歌音韵、格律、词采、对仗、用典诸方面精心揣摩，争奇斗艳，诗歌艺术形式日趋规范，技巧更加圆熟。最适合于唱和应制的文学样式——律体诗歌，经过文馆学士的反复研练，其形式终于逐渐固定下来，因而学界有律体诗歌定型于初唐文馆学士之说[①]，不为无故。可见文馆创作对诗体发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文馆创作还能促进、带动文坛风气的变化和转移。文馆都设置在中央要害部门，较易造成影响，形成文坛风会。初盛唐文馆中几乎汇集了当时文坛所有最著名的人士，如武德年间的秦、齐二府馆与太子建成府馆，贞观中的弘文馆，龙朔中的东台详正学士，武后朝奉宸府，中宗修文馆，睿宗昭文馆，差不多将当时诗苑最负声誉的文士囊括殆尽，其诗歌创作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而且其中不少人属于文坛名宿，具有文坛领袖的地位与影响，其诗歌体格多为后进所仿效，故初盛唐文馆往往同时作为文坛中心而存在，这一时期文馆文学代表了主流文学，体现了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基本特征。它作为主流文学，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外地为官的文人，包括部分江湖草野之士，因应举、赴选、赴任、流贬等原因，常往来于

① 陈铁民《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